

大数据时代网络青年平庸之恶的生成逻辑 及教育消解

曹克亮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网络青年平庸之恶是一种特定网络环境场域下的“无思之恶”, 它源于思维的匮乏, 其中亦有对网络群体道德认知的贬损与裹挟。在道德承担上以“齿轮理论”为道德推脱的借口。在大数据时代之下, 网络青年的道德空间想象力被限制, “扩展的心灵”想象力和道德共同体意识缺乏。只有不断借助教育消解网络青年的意识分裂与对抗, 培养一种道德反思判断力, 才能有效降低平庸之恶的生成风险。只有积极构建一种网络时代的沉思性生活, 才能达成网络时代之下青年的道德“理解”与“同意”。

[关键词] 大数据时代; 网络青年; 平庸之恶

[中图分类号] G 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2023)04-0054-08

阿伦特认为, 平庸之恶不在于作为人的罪大恶极的病态行为抑或意识形态偏见, 而在于对罪责的无知与浅薄, 是一种真实的“无思”之恶, 这种恶甚至与作为人的“卑鄙动机”都不相关, 也没有任何利益甚至是意愿的驱动, 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之下思考能力的丧失和作为个体良知的泯灭而形成的恶。互联网时代的青年社群聚集和话语环境特征, 让网络青年处于自我判断力和自我反思力的“卡夫丁峡谷”困境之中, 网络青年的聚集之地造就了自我对话和自我反思的匮乏, 个体思维被围困于群体冲动抑或顽固的群体价值信念之下, 一种基于大数据信息支撑的偏执信念体系和判断力障碍诱发了网络青年个体的平庸之恶。

一、网络青年平庸之恶源于思维的匮乏

(一) 思考与自我道德理性建构的一般性逻辑

自我道德理性的建构无法离开对自我同一性伦理命题的认识。苏格拉底曾经有两个重要命题, 第

一是“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 第二是“与自己矛盾要比与多数人矛盾更糟糕”。对现代人而言, 它更像是一种廉价的道德说教, 没有人乐意行恶, 更没有人愿意遭受恶行。这与德谟克利特“与遭受不义者相比, 更不幸的是行不义者”的观念似乎天然冲突。苏格拉底的道德学说指向“自我”, 而德谟克利特的道德学说则指向“他者”。不管如何, 道德建构似乎不能以简单的方式仅指向“自我”或指向“他者”, 因为指向“自我”的道德建设, 关注的是德行本身的心理生成机制及其对自我同一性的维护, 道德需要为寻找自我同一性做出判断和裁决; 而指向“他者”的道德建设, 更像是一种道德追溯论和道德结果论, 以对“行不义者”的最大道德追溯来构建道德自我。苏格拉底自我同一性的道德建设无疑将思考抑或沉思的能力推到了道德建构的前沿。如果说“知识即美德”指向对知识理性的崇高至善的追求, 道德的沉思无疑也是对道德理性的至善追求。那思考怎样塑造道德和进行自我道德建设? 思考对道德的形塑源于人类对至善的理性追求。自然知识让人们获得了理性对自然

[收稿日期] 2023-04-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研究”(22JDSZ3004); 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数字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的理念、方法、路径研究”(22GXSZ019YB) 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22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以网络评论特色工作室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KT2022415)

[作者简介] 曹克亮(1982—), 男, 安徽颍上人, 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国计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界的解释并产生了科学；道德知识让人类在做出了道德判断和行动之前慎思笃行，产生了伦理。“在思考活动关注诸如正义、幸福、节制和快乐等概念时，在它为了那些不可见的事物（为了让我们表达生命中的事件和意义，语言把他们赐予我们）而关注这些词语时，思考就陪伴着生活。”^{[1]180}思考之于道德不是道德家和哲学家的特权，而是任何普通人都需要拥有的生活和能力，如果有人认为思考之于道德的建构会产生道德虚无主义，那是对思考的严重误解，人的思考对于自我道德的建构意义，就是要消除日常生活世界的平庸之恶。我们必须以思考诉诸我们的德行，并检验其是否有违“和谐自我”的概念。

首先，作为自我道德理性构建的思考显著降低了无知之恶的风险。人为什么会遵循意义而活，将“未经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话语置于理性生活的考量之内？这是因为思考本身是在道德自省中将自我与他者的道德承担都作为手段和目的而给予审视，人之所以爱智慧是因为人还认为自己不够智慧，之所以崇尚美德是因为人认为自身还不够至善，虽然人可能知道自己追寻至善是不可能得到想要的至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人追寻至善的道德诉求和愿望。

如果恶只在思想层面，即被称为一种“恶念”，显然，不被说出来，也就不会遭受他人的道德审判，而“恶念”一旦付诸行动转化为“恶行”则一定会遭受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惩治。思考之于自我的道德构建在于先从“恶念”中清除“恶行”的观念基础，让人在沉思中行动，在思考中进行道德观念约束。这种基于思考的道德观念约束即使对“临时起意”的恶行也始终有效，也是防范因冲动、偏执而做出的恶亦或因无知无思导致的平庸之恶最好的观念保护。同时思考也将对他者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承担置于考虑范围之内，一个恶的产生终究至少涉及行不义者、遭受不义者、旁观者三重身份维度，不论这三种身份在恶的结果中做出何种道德选择，是道德赦免、道德追诉抑或道德宽容。这终将无法摆脱恶行之后三种身份对类似道德行为和难题的道德再考察。思考对于他者的道德要求审查源于对自身道德的审查，思考对于他者的道德承担源于对自我道德承担的反思。

其次，作为自我道德理性构建的思考凸显了良心的道德价值。“良心，如我们在道德和法律事务

中运用它的那样，被认为一直在我们心中存在着，就像意识一样。”^{[1]186}良心是被语言从意识中分离出的道德概念之物，它不同于自然之光、上帝之声，与康德所言的实践理性也不尽相同，良心作为意识的语言性分离，在道德层面的出场总是在以“良心回想”（afterthought of conscience）的方式而进行。人的良心在道德建设中总会以罪行观念、未经审视的观点和对恶的恐惧而被唤醒，这种良心唤醒显然来自于道德思考层面，不论这种唤醒是基于对自我同一性矛盾的厌恶还是出于对恶行惩罚的恐惧，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了良心的道德价值和思考之于自我道德理性建构的价值。

如果一个行不义者从不对自己的恶行进行良心的自我谴责，或者认为他所犯下的恶行会很快被忘记，作为思考的自我道德理性构建还有必要吗？其实，真正的遗忘是不可能的，这在恶行未受到应有的惩罚时更是如此。所谓恶行被遗忘也只是行不义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任何行不义的恶行都不会被轻易遗忘和丢弃，行不义者不被法律惩治，只是暂时性的正义迟到，但不管基于遭受不义者还是旁观者，都不会对行不义者的恶行熟视无睹，行不义者的“从不进行良心的自我谴责”是一个良心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双重“伪命题”，只要行不义者犯下恶行，对于恶行的法律追责和道德追诉就会始终伴随其中，这种伴随有时不会随着恶行本身的惩戒结束而结束。作为道德意识思考之物的良心如同一座座重围和障碍，为人的行动设置道德围栏（morality fence），以防止欲望和恶念泛滥成灾。

最后，“独在”与“自思”有力提升了道德理性建构的深刻性。平庸之恶的根源在于自我反思的匮乏，即作为独在（solitude）自我，一种二而为一的自我反思与自我对话意识和能力的缺乏。道德是蕴含于个体性之中的存在，它与单个的人有关，虽然伦理调节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其道德承担必然落实于个体之上。一个人真正的恶不是因为其遭受来自周围人的风俗、习惯或行动的影响，也不来自于某种命令，而是来自于“我对我自己做出了何种决断”的自我本性。任何个体都可以在思考之下进行自我道德理性的建构，也可以在思考后做出道德行为的最佳选择，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人不能丧失思考和自我审查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全部生活的需要。

大数据时代，网络青年的自我道德理性建构和

沉思性生活的基础大多被大数据、算法主宰的知识、信息、空间所主导或中介,青年道德理性建构的知识基础、共情机制和共在场域难以实现有效整合。网络生活的迅捷性、即时性、涌现性和模糊性特点,网络语言及理解行为的差异性、诱导性和裹挟性难题都使得青年“良心回想”的时间和空间机制有所失效。由此,在面对网络生活和道德事件的“独在”和“自思”的“知情意”统一能力都有所下降。因而,广大青年提升自我道德理性的思维意识、思维能力至关重要,如果缺乏反思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很难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生活保持警惕并进行有效应对。

(二) 再审“齿轮理论”(Cog-theory): 网络青年平庸之恶对群体道德的认知匮乏与裹挟

阿伦特曾以“齿轮理论”解释“集体罪恶”或“组织罪恶”。所谓“齿轮理论”意指“不论是自己或者其他犯罪或政治组织的分子,当他们为自己的罪行辩解时,往往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小齿轮,全心全意为上级的命令效力。其他人若处于相同的处境,也会做一样的事。”^[14]这种通过对个人罪责进行“小齿轮”式的辩解,更像是一种脱责说辞,这种合理化的解释实际上是一种法律脱责的辩解,但在道德层面,它不具有必然性的存在空间。“集体罪恶”的法理层面的合理解释,难以适用于道德领域。毕竟实施不义行为的是个人,即使这个个体被称为“小齿轮”,但“小齿轮”的不义行为毕竟是个体基于某种思考或无思环境下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结果也毕竟导致了恶行本身的发生。

当下,不少网络青年以社群聚集的方式生活于网络世界之中,青年在网络世界的自组织聚集形式、交流形式、话语方式和权利表达方式均呈现与已有现实生活世界不同的特有群体性特征。网络青年群体以一种后现代的网络“亚文化”形式展现着自身的文化性存在;同时,在这种“亚文化”之中所形塑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自我都在趋向“无思之地”。这种“无思之地”的自我在网络群体组织中以“兴趣”或“特有价值”主张的个性张扬和认同感作为终极归属。这种网络世界存在方式的独特性必然加速道德层面的“有思”退化和“无思”出场,“有思”退化和“无思”出场符合互联网传播的现代特征,在大数据及其算法的助推下,网络青年的“兴趣”群体和“特有价值”群体在网络世界的道德判断能力也不断退化。

目前,以网络为媒介场域可以将人的生活分为“在线生活”和“非在线生活”。在线生活场域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开放性。网络青年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以各种特有的但是小众的方式联合和聚集,主要基于兴趣、价值等细分领域,如游戏、玩偶、手办、电影、音乐和运动等。在线生活的群体性特征和聚集性特点给予了网络青年群体道德认知特有的空间局域,网络生活在网格化生活中进行,认知智能在数字算法化智能中开启。而网络生活主导下的群体道德认知正在以一种共同意向性的方式形塑网络青年的道德判断方式,这种网络群体的共同意向性自然而然地隐含了群体之下的诸多认知偏见,这种认知偏见既有知识体系不健全的知识匮乏因素也有信息爆炸所导致的认知混乱因素。更重要的是网络青年对网络群体所谓的“信任”“尊重”甚至是“捍卫”的价值主导观念,该价值观念主导了网络青年的行为认知和道德判断。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教授尼尔·拉夫利(Roughley Neil)认为“一个基本的担忧是,关注特定个体的‘尊重’的核心道德态度可能会在承诺将特定他人视为与承诺按照群体规范的内容平等对待他人的过程中迷失。”^[2]这种担忧在网络生活的空间局域和青年生活的类型局域中更容易发生。不少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囿于数字时代网格化生活的狭窄视域之内,在智能算法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走向道德判断的“无思之地”,成为一群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使用“道德审判”武器的道德裁决者,抑或成为一群无视道德规范践踏道德尊严的“道德失重者”。网络青年在接收和对待道德问题时极易走向“道德悬崖”,在审视道德规范和道德惩戒的态度上又时常借用“齿轮理论”为自身的道德无知做辩护。因此,需要主张一种网络的“沉思性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以教育消解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

二、网络青年平庸之恶是道德判断力低效的个人之恶

(一) 网络青年道德判断力低效的成因分析

第一,网络青年道德判断力低效源于青年网络道德空间的特性限制了道德的空间想象力。判断力是通过思考和意志两种人类能力来实现其功能,从而做出判断和裁决。思考活动的功能在于通过自我对话实现对社会成规和教条的批判性审思,从而评

价值以及意见的正当性和优劣。而意志则是对差异的价值、意见和成规等做出裁决,并提供行动的能力。即实现(思考—意志)—判断—行动的转换。网络以开放的空间形态吸纳了青年,并塑造了青年的生活形态,网络及其增强技术的伴随性特征让青年的判断力实现了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是从原有的“非在线—半在线生活”的思考模式向“全在线生活”的思考模式转换,道德判断力从现实形态的真实道德世界向虚拟的网络道德世界转换,现实形态的真实道德世界原本是狭小的现实道德场域,青年道德判断的成本和频次都会是短小而近身的,而网络空间道德场域是开放性的,道德判断是建立在对数据信息识别和转换的媒介传播特征之内,网络的道德判断已经远离了道德事件本身,只限于对数据信息的识别和判断之中,这种网络道德的判断力空间相较于网络空间而言,不仅没有扩展反而是缩小了。在相对扩展的网络空间,留给道德判断力的空间和资料只剩下了数据和信息,这种远离真实道德事件的网络道德场景化形态限制了网络青年的道德想象力。因此,就会呈现网络道德评判的“两级化”的单调模式,合情合理、公正客观的道德评价更可能被极端模式所代替,这也给网络道德空间治理留下了不小的难题。

第二,道德的空间想象力狭窄让“扩展的心灵”和道德共同体意识缺乏,从而产生了更多的平庸之恶。所谓“扩展的心灵”(enlarged mind)是指通过想象力扩展对不在场事物的心灵感知和领悟能力。有时这种“扩展的心灵”依靠概念图示(concept schema)才能获得清晰而具体的展现,比如,我们判断何为英勇的行为时,总是通过以脑海中形成的英雄形象和行动为典范,再将某种行为与英雄行为进行对比和具象化概括,从而得出英雄行为的判断。而道德的网络空间常被限于数据和信息的范围之内,切身的道德想象力被信息化和数据化,通过概念图示做出道德判断的场景被剥夺,人的“扩展的心灵”无法有效发挥,只能陷入信息和数据的“道德直白”之内。显然,这种变化会损害构筑道德共同体的情感基础,网络道德共同体意识在缺少了情感联结的基础时当然会难以为继。网络青年看似紧密的兴趣聚集和价值联结方式,无法构筑起网络道德共同体的真正基础,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在狭窄的网络道德空间内依然处于“无思之地”的困境之中。“‘世界’作为上手用具的

整体经历了空间化,成为只还摆在手头具有广袤的物的联络。”^[3]网络青年已经经历了这种世界空间化的整体性转向,生活世界已经具象化为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网络的空间之物与现实世界的自然之物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网络“物”的联结形式让生活世界的场所中立化为纯粹的手段,网络世界反而成为目的本身。这种“倒置”的世界留给道德的空间越来越狭窄,道德想象力越来越匮乏,因此,平庸之恶也就在“物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网络空间之内任意游离了。

(二) 网络青年平庸之恶的个体性之维

罪恶的平庸性就其本质来说是“无思之恶”,是道德判断力低下的表现。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就其道德生产空间来说,实际上指向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两个维度,并且平庸之恶也表现于这两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扭曲,对现实生活未经审视明辨的偏执信念,对过去习以为常的价值判断的执拗造成对网络世界的无思和任意,对网络世界的无思和任意则催生了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但是,平庸之恶的确是生产于无思之中,却并非等同于无思。就其道德表现来说,任何恶行都是“有思”之后而采取的。网络青年恶的平庸性根本问题不仅仅在于对“恶”的不可知,更在于对“恶”的不反思。反思是思维的一种高级形态,更多指向个体内在性的评价性思维活动。评价性思维活动孕育出良知这种道德情感,反思则是对这种道德情感加以运用。平庸之恶的“无思”不是无思维性,而是无反思性,无法运用反思性给予自身个体以道德上的指引。因此,网络青年平庸之恶的个体性之维主要体现在反思的个体性之维、承担的个体性之维当中。

自我反思不仅仅是自我对话,更在于对引领道德判断进行的决断方面运用良知的能力。自我反思通过个人意志付诸实施,通过个人意志的强大定力去防止道德决断的任意性。“人的条件包括的不仅是生命被给予人的那些条件。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4]网络青年的自我反思在高度物化的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中展开,其道德反思的场域和条件都在发生着改变,自我反思的个体性被网络道德空间的狭窄性进一步放大。个体道德反思构建越发显得“自我”甚至是“任意”,这种自我“排除”消解

了现实世界及其道德情景,也让道德个体的自我更新能力处于低谷,个体道德重塑的难度日益加大,从而扩展了平庸之恶的边界和破坏性影响力。

就平庸之恶承担的个体性维度而言,网络青年不具备集体责任的两个要件,第一是隶属于某个团体,并且作为其中的一员的身份要件无法凭借自身意愿解除。第二是为“我”不曾做过的事负责。网络青年所生活的网络世界,建立在兴趣自由和价值自由之上,多数具有网络“亚文化”的文化属性,不具有政治共同体组织和成员的身份特性。这就造就了所谓的集体责任失去了存在的“集体”特征,而所谓的“饭圈”群体,更是一种文化属性的表达,而非责任集体的表述。“江湖术语、套路规则、流量矛盾、固粉策略”^{[5]66}成为“饭圈”群体文化维度的四个方面。“饭圈”问题的责任治理需要“尊重兴趣,正向引导。尊重差异,拒绝跟风。尊重成效,发挥功能。尊重文化,创新治理。”^{[5]72}结合个别人的过激行为的惩戒同步进行。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并非建立在此种集体环境之中,不必对“我”不曾做过的事负责。网络青年的平庸之恶是被网络生活环境和道德环境狭窄性裹挟的个体良知之恶,平庸之恶的道德责任承担也一定会被划归于个体道德承担视域范围之内。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青年平庸之恶的教育消解路径

(一) 大数据时代下意识分裂与对抗的教育消解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和万物互联成为人类生活新的场景空间。数据不仅在驱动社会而且在重塑人类自身,人类意识在现实空间与数字化空间中变得日益分裂。“数据驱动社会指随着互联网等信息通信网络的进一步应用,以及 IoT (Internet of Things) 的扩大导致的数据产生量、交换量和总量的增加,使所有社会领域都可以形成 CPS (Cyber-Physical System, 从现实空间收集数据到虚拟空间,使用 AI 等对这些数据进行解析,并将解析结果以自动化控制等形式再次反馈给现实空间的连锁系统) 的社会。”^[6]。在数据驱动社会之中,在赛博格空间之下,意识如同溪流一样以数字碎片化的形式存在着,也塑造着每个人自身的意识形态。“无论多么微小、无关或隐私的小事,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任何数据点都可以指向一个人个人

身份认同的描述”^{[7]71}。意识分裂的现实表征在于对个人身份认同和自我意识塑造的差异。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与自我意识在网络时代下呈现叠加性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状态,网络社会自我是一种技术的产物,这种自我技术借用的就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工具。

网络青年对自我意识在网络场域中的显现显然更加敏感,社会自我的分裂和塑造也更加清晰。网络青年的“P图控”“美颜控”“打卡控”就是网络社会自我塑造的最好例证。显然这种网络社会自我塑造与现实中的真实自我塑造是不完全一致的。P图和美颜后的照片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己肯定存在差异。这种自我塑造带来的结果就是产生“我真得挺美”的错觉意识。这里的“真的”或许只是“假的”。网络时代下意识的分裂与对抗时刻在发生,网络青年如何消解这种网络自我意识的分裂呢?简单地给予“回到现实”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网络空间已经是现实本身,如何能够做到“逃离”而真正回到所谓的“现实”呢?对抗这种网络自我意识分裂最好的方式就是培养一种“沉思性生活”的能力。网络青年不能沉迷于网络虚拟空间的自我社会塑造的漩涡之中,“回到现实”不是抛弃所有当下网络空间的虚拟现实,而是要以一种沉思性生活的自我真实状态呈现于全部生活之中,这种呈现不仅仅是现实的呈现也包含网络的呈现。只有这样才能消解网络时代意识分裂所带来的自我认识困境,塑造真实自我,进而为道德自我塑造留下可能性的空间。

(二) 大数据时代道德判断力的教育培养

判断力简言之就是判断能力,道德判断力就是针对道德问题及道德行为的判断能力。其中,反思判断力是影响道德判断力最为关键的因素。反思判断力与主体的感性条件获取存在极大的关联。“反思判断力作为判断力本身的深层活动,与其感性条件即先验想象力自由的合法则性是分不开的。虽然在道德判断中判断力作为规定性的判断力起作用,反思判断力的作用因此被遮蔽了,但道德判断仍然包含了判断力的反思作用,因此道德的判断力之运用需要某些感性条件。”^[9]。网络时代,道德判断力所依据的反思判断力被不断缩小,反思判断力所依据的感性条件(更重要的是作为自由合法的先验想象力)被网络空间所挤压。因此,需要加强网络时代的道德判断力的教育培养。

首先,有效应对大数据时代反思判断力领地的缩小,培养数字时代的“反凝视”能力。网络时代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放大了作为自我存在和自我所处位置之间的差异性。即“自我存在”与“自我所处位置”的隔离状态被无限放大,人原本的“自我存在规定自我位置”被网络时代的“自我位置规定自我存在”所取代。人的反思判断力的领域也从自我存在的现实领域转移至网络世界的数字化领域。这种“自我所处位置”的迁移带来了意识的迁移,人们更愿意相信网络上的那个“自我存在”是真实的自我,而线下的自我反而是为网络自我服务的存在背景。

网络时代作为信息爆炸时代,信息爆炸带来的恰恰是判断力的低效,判断力低效就是源于网络时代的延时效应,“信息与通信技术增强了延时效应,因此在数字化环境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很容易对同一事物进行反复辨识。问题是,虚拟环境可能会正常运转,也可能不会正常运转”^{[9][81]}。反思判断力面对爆炸的信息的重复判断会带来判断力的审美疲劳、道德判断疲劳,人们很容易陷入简单粗暴的判断之中,从而造成反思判断力缺乏进而影响道德反思和道德行动的进行。面对反思判断力领地的缩小和数字化网络“凝视”的大行其道,网络青年应回归到现实判断和常识判断的实践逻辑轨道上来,以积极生活的现实态度应对网络生活的虚拟自我认同,以现实生活的“反凝视”应对网络数字化的“凝视”,从而构建自我认同和自身道德同一性的基础,反抗网络时代的平庸之恶。

其次,增强对现实与网络生活的共通感体验,为自由而合法的想象力扩展留下足够空间。网络时代的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多数情况下处于平行甚至隔离的状态,人只是在不同的空间中转场罢了,这种现实与网络的转场与切换,实际上使得人的“共通感”被反复切换,这种切换不仅包括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频繁切换,还包括现实人与虚拟人身份的频繁切换,人的“共通感”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变得麻木了,人不再“设身处地”地想问题和对待他人,也不再“此情此景”地看问题和处理问题。这种共通感的缺失给青年的道德情感塑造所依据的感性条件以及自由而合法的想象力培养造成了巨大困难。青年自由而合法的想象力的缺乏导致他们很难在意识之中对美的问题和道德问题做出准确而统一的判断,因为它缺乏了具身性和感受性

的情感基础。自由而合法的想象力当然不是美和道德本身,但它却是容纳和展现美和道德的基础。网络青年的道德判断力培养需要以自由而合法的想象力作为支撑,这种支撑有利于增强对现实与网络生活的共通感体验,从而不为平庸留下空间,不为恶行留下领地。

(三)大数据时代下青年沉思性生活建构及道德“同意”之见的达成

1. 大数据时代下青年沉思性生活的建构。不可否认,网络时代的信息与媒介技术正在构造全新的生活图景,网络青年的生活模式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革。思考与行动的递进关系变得越发模糊,网络在线的生活中,人们越来越在缺乏深刻思考的情况下就直接行动了。一种“积极生活”的态度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沉思性生活”,这种改变或许是被动发生,但却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形式发生着和冲击着我们的生活领地。

如何教育培养网络时代之下的青年沉思性生活?这仍然需要回到青年生活的现实图景中予以考察,当然还需要回到“当下网络时代反思性生活到底是什么中”予以考察。

首先,从现实生活场景出发,互解工具理性和利己主义温床。青年的现实生活疆域不断变得狭窄而单调,现实生活的压迫感和被动性消解了青年的思考原动力,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中,取舍行动的关键已经由合法性与合道德性转变为利益驱动的快速性和工具性。以利益驱动的快速决断和工具理性模式是一种简单高效的生存模式和决断方式,这种决断方式的有效性体现在“为了自己,立刻采取行动”,从而为自己的行为奠定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基础。这显然与“遭受不义比行不义要好”的道义论道德相悖,但是,现实的道义论道德空间几乎所剩无几,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十分可笑的。不过,快速决断的行动方式带来的只是决断的自我正当性和快速性,根本不具有普遍的道德合法性,在人人都在进行自我技术塑造的假面生活场景中,不仅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道德的冲突也会更加显著。于是,就网络群体而言,各种价值观念和一些标新立异的道德诉求被置于网络和现实的环境下予以讨论,这些道德诉求和讨论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不道德的,足见道德滑坡是多么的明显。

其次,从网络生活场景出发,谨防“私人语言”对道德沉思和理解的破坏。自我技术塑造的

自我认同和道德认同已经变得无比狭隘了,这如同维特根斯坦“语言的游戏”一样,没有“公共语言”就没有“私人语言”,而一旦“公共语言”被用于个人语言,它就变成了“私人语言”了。网络空间的话语方式显然是公共性的,但被网络个体使用后就变得私人化了,这种私人化的表达方式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或情感偏好,也带有显著的私化道德的个人痕迹。原本的道德公共性性质越发变成被依据个人行动的利益正当性而牵动的事物。网络空间的道德行动和道德判断显然也变得无比快速而个体化,虽然快速并不等于“无思”,最起码留给“沉思”的时间和空间在变得短小而狭窄,这显然更容易促成平庸之恶的产生。

最后,建构基于情感的网络共同体意识和共通观念。网络时代之下青年沉思性生活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体意识和共通感观念上的自我建构、自我反思性的生活。我们做出的任何判断抑或采取的任何行动都隐含获得认同的强烈意志。获得认同的最好方式就是以共同体意识反思自身行动的社会价值和共同价值,其中当然包括道德上判断和行动上的共同价值。个体行动所牵动的个体价值在价值维度上与社会共同价值是相通的,共同体意识不是要剥夺个体意识或个体价值,而是要建构一种每个个体都认可的价值。作为个体来说,需要培养基于情感的共通观念,这种共通观念是获得认同的意志得以实现的必要基础。不然,人的行动就会失去社会性的认可和道德上的助力。网络青年构建自我和构建自我反思性的生活需要增强反思性判断的能力。这种反思性判断的能力不是单纯的自我批判,而是基于个体与群体、自我与社会、法律与道德的自我表达,它应该是一种生活的必备能力。只有实现自我合一的自我表达和社会表达,才能构造出自我反思性的生活基础,为个人道德完善和社会公德完善贡献力量。

2. 大数据时代下青年道德“理解”与“同意”之见的达成。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更加无疆界、同步性(时间层面)、不受限制(空间层面)和互动性(交往层面)的信息社会。准确来说,大数据时代是全新的更高层面的网络时代。任何人的生活现实和道德意识都会被以全新的大数据方式予以塑造。不管如何,人都需要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或之中达成对自我同一性的整合。这种自我同一性必然要求“理解”与“同意”的在场,自我同一性要

求的“理解”是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理解”的内在规定性和价值一致性,其显著特征便是自我要先“理解”自我,“理解”自我是一种内在规定性要求,青年要清楚自身的境况和存在基础,以理解为基础构造自我、完善自我。同时,个体要实现对社会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完成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向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转换的基础,也是构造社会自我同一性的必然之路。自我同一性在道德上必然要求道德“理解”。另外,自我同一性的达成还需要构筑道德“同意”,道德“同意”不是法律“同意”,道德“同意”更多要求作为对道德的内在“同意”,它是一种认同表达。任何的善或恶都是在行动上做出的。道德“同意”通过给予行动前的道德判断设置“同意权”,从而降低行动的道德风险系数。

大数据网络时代之下青年要构建道德“理解”与“同意”,需要冲破大数据和算法对自我中心主义认知和自我价值偏见狭隘空间的束缚,以智能时代的“物—我”一体的认知和价值塑造自身,妥善处理个人行动和道德判断,谨慎思考网络世界的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属性关系,为避免个体平庸之恶而达成“理解”和“同意”的完全在场。

[参考文献]

- [1] 汉娜·阿伦特. 反抗“平庸之恶”:《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M]. 陈联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2] ROUGHLEY. From shared intentionality to moral obligation? Some worries [J].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8, 31 (5): 736-754.
- [3]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30.
- [4]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
- [5] 吕鹏,张原. 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J]. 中国青年研究,2019(5):64-72.
- [6] 福田雅树,林秀弥,成原慧. AI联结的社会:人工智能网络化时代的伦理与法律[M]. 宋爱,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5.
- [7] 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第四次革命:人类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M]. 王文革,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37.
- [8] 陈永庆. 反思判断力与道德的感性学——对康德《道